

试论茶叶入藏的年代

李锦萍 王静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7)

[摘要]茶叶作为日常饮品,在藏民的生活和汉藏历史上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百年来,茶叶仿佛青藏高原上流淌的生命之血,见证着藏地和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将藏地和祖国腹地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然而关于茶叶入藏的时间,可谓众说纷纭,学界普遍认为茶叶是在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的。但笔者认为或许远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茶叶已经随着其他商品传入藏地,首先被一些毗邻川滇的部落接受,再逐渐西传进入雅鲁藏布江河谷地。青藏高原上早期的部落“恰”的名称也许与茶叶的西传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青藏高原;汉藏关系;茶;恰部落;藏民族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2.1570

引言

茶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无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甜茶馆,抑或是迎客必备的酥油茶,甚至是在其宗教仪式、日常生活、礼仪习俗中都显示出茶叶在西藏人民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其谚语曰:“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汉语意思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正因为茶叶对藏族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而藏族地区本身并非茶的原生地,也没有种茶的习俗,藏民族要想获得茶叶,必须从中原运至藏地,因此茶叶成为了汉藏交往中最为重要的商贸物品。《宋史·兵十二·马政》中记载元丰“群牧判官郭茂询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中原王朝也因此以茶实施羁縻政策,最迟在北宋年间,“茶马互市”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实际上,“茶马互市”从一开始就并非出于单纯的经济目的,正如南宋兵部侍郎陈弥所说:“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不藉马之为用,故鸳胎下乘,一切许之入中”。由此可见,早期的“茶马互市”是为实践中原王朝的“治边理念”而被推行的。后虽朝代更迭,但元明清各代均视“茶马互市”为重要的“国家行为”。西藏大学历史学教授次旦扎西曾说,藏民常食牛羊肉等高蛋白、高热量食品,少果蔬,助消化、解油腻的茶叶逐渐成为必需品。而与西藏相邻的四川、云南等地盛产茶叶。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茶马互市遂成为汉藏之间的一件大事。但茶叶何时进入藏地?各家说法不一。

一、茶叶入藏的时间众说纷纭

关于藏地饮茶习俗,不仅汉文史料有记载,如《新唐书·物产类》便记载:“西藏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其性暴,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食,以茶为主。其茶熬极红,入酥油,盐揽之,饮茶食糌粑,或肉米粥,名土巴汤。”藏文典籍也对藏地饮茶习俗,以及茶叶由汉地传入藏地的历史有记载,如成书于15世纪中叶著名史书《汉藏史集》在“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两章中专门介绍了茶叶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并说:“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袞布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1]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茶叶是在吐蕃时期传入藏地的,至于传入的具体时间,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茶叶是随着文成公主入藏而进入藏地的;还有人认为茶叶传入藏地与汉地佛教传入藏地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些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推测出的结论

占据了主流地位。近年来,学界也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杨海潮就根据语言学的知识认为茶叶入藏的时间远在唐朝之前,“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应该是在西汉扬雄(前53-18)《方言》以后、隋代(581-619年)陆法言《切韵》以前。”^[2]笔者比较赞同杨海潮的说法,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茶叶在吐蕃时期进入藏地的证据不足;第二,茶叶早在吐蕃以前就已进入藏地是具有可能性。

二、茶叶在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的论点证据不足

茶叶在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的论点证据不够充分。首先便体现在历史文献资料本身存在缺陷。在研究茶叶传入藏地的时间时,学者研究探讨的历史依据一般都来自于汉藏史料,而藏族史料大多都是12世纪以后的著作。松赞干布时期,西藏著名学者吞米·桑布扎创制了藏族文字,西藏历史也从此由传说时代进入文字记载的时代,这无疑加大了研究吐蕃以前藏地历史的难度。经过数百年后再去追记历史,本身便不完全可信。加之藏族受到藏传佛教的深远影响,藏文文献的编纂者在撰写史料时便已经对材料进行了筛选,对宗教内容的记载颇为详细,往往会忽略藏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或许有关茶叶的记载便因此而在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较晚了。在唐以前,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的之间交流有限,很少有汉地的人进入青藏高原,更没有人留下藏民们生活细节的文献记载,因此在汉文文献中很少发现有对吐蕃以前的青藏高原的记载。即使有唐代文献记载了藏地饮茶的习俗,但并不能就此证明茶叶是在唐代时才传入青藏高原的。

其次,对史料的解读存在偏差。《王统世系明鉴》中对文成公主入藏有详细的记载,其嫁妆十分丰盛,不仅有佛像、佛经、经史书籍、各种炊具和精美的食品等,更重要的是有各种茶具和香醇的饮料。虽有学者以此认为,茶叶是随文成公主入藏而首次进入藏地,但此种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汉地茶具入藏并不能证明藏地没有具有藏族特色的茶具,更不能证明在此之前藏地没有饮茶的习俗。也有学者根据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监察御史常鲁奉使入吐蕃议盟期间发生的一件趣事为例,《国史补》卷下中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证明茶叶是在中唐时期方传入吐蕃。但这份史料本身也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广泛饮茶,因此才会对茶叶有比较完整的分类体系。并且从茶叶的名称来看,也大多产于汉地。可见,在中唐吐蕃议盟之前,吐蕃王室就已经对茶非常熟悉,所以茶叶不可能是在中唐事情才传入藏地的。

再次,研究仅局限于文献资料,虽有汉藏史料相互印证,但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以真相。虽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并未发现有关吐蕃王朝以前藏地饮茶的直接证据,但并不能因此便否定藏地无茶叶。在笔者看来,考古无发现与青藏高原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密不可分。青藏高原早期是游牧社会,逐渐才在一些河谷地带进行农业生产,演化为农牧结合的经济生活模式。但即便到今天,定居农业仍只分布在少数环境优越的地区。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不利于物质文化遗迹的保存,所以没有发现藏地饮茶的直接证据并不奇怪。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青藏高原在吐蕃王朝之前没有饮茶之习俗。

最后,受到定式思维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青藏高原饮茶之风的兴起是自上而下的,即先由统治阶级通过外交方式从唐代引进茶叶,后来才逐渐被民间接受。但至于为什么不是自下而上传播,即先有民间饮茶的习俗,从而影响到统治阶级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如果能够打破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也许会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综上所述,茶叶在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的论点证据是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文献资料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对史料分析和解读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笔者相信,虽然对茶叶入藏时间的探讨面临着诸多问题与困难,但只要能够大胆假设,小心并细致的去求证,这一问题必然会有新的解释和新的发现。

三、茶叶入藏时间之新探

茶叶在吐蕃以前入藏具有可能性可分为两个。第一,中国西南的蜀地是茶的原产地,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相当悠久。西南地区与青藏高原甚至南亚、西亚的商贸关系早在中原王朝的势力进入四川盆地之前,就已经非常兴盛。第二,从茶在藏语中的发音“恰”和雅鲁藏布江流域古部落“恰”,以及广泛流传在藏地的“盐与茶”的民间故事中的“辖”,似乎可以找到茶在藏地传播的线索。

中国种茶的历史悠久,四川盆地又可谓是茶的原产地。汉代著名文学家王褒的《僮约》中有“武阳买茶”之说。可见早在汉代,蜀地就已有饮茶之风。在中原王朝的眼中,蜀地处于西南地区,交通相对闭塞,似乎与外界之间的交流很少。但实际上这是中原王朝对蜀地的主观想象,并且带有浓厚的中原正统思想在里面。蜀地与外界的商贸往来历史悠久,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便在大夏国见到蜀布和箠杖,在询问当地人后才知道中国西南早有一条经过缅甸、印度直达中亚、西亚的国际商贸路线。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商贸关系,虽以“茶马古道”川藏线而斐名中外,而“茶马古道”一般被理解为兴起于宋代以来的汉藏茶马互市。但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出此种认识具有局限性,并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考证出“至少从距今4-5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这条道路就已经被古代人类所开通和利用,并已成为今川、滇、藏三地之间远古氏族人群迁徙流动及三地间文明传播的重要孔道。”^[3]直到元明时期,横断山区还分布着诸多部落,它们互不统帅,但却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存在经常性的人员流动和商贸的互动。近年来,有学者根据考古资料构出一条起源于石器时代,横跨黄土高原、四川盆地、青藏高原,甚至“穿越山口而至喜马拉雅山南缘,然后沿着山麓西进,终至克什米尔地区”,进而延伸到中亚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并对其特点有精要的论述,“这个通道不可能像汉代前后所谓‘丝绸之路南道’那样,短期内主要通过偏南平

原城市间链接完成贸易,而主要是通过文化上环环相扣的影响渐次形成,但总体上也当是人群西移过程的反映。”^[4]很好的概括了从四川盆地到横断山区到青藏高原之间广袤地域内文化传播的特征。

茶叶不仅作为蜀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或许还参与了早期蜀人的一部分对外贸易行为。“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苻等部交换牦牛、苻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可见,民间商贸互动往来往往早于王朝的国家行动。因此,茶叶进入藏地具有类似的特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恰”是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流域古老部落的名称。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II中便记叙有“恰”与“穆”两大氏族之间的关系。关于“穆”的地理位置,有学者考证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和横断山区一带。而“恰”的地理位置,根据吐蕃时代留存的《工布第穆刻石》有人考证,应该在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带。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这一地区历来都是从四川盆地跨越横断山区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因此,茶叶是通过民间贸易互动到达这一地区的可能性很大。

藏族民间故事“盐与茶”也为“恰”部落与茶的关系提供了佐证。此故事开篇便说:“很早很早以前,在一条河流的两岸,有两个部落,住在东岸的叫‘辖’部落,住在西岸的叫‘怒’部落。”故事的结尾却是“辖”部落的美梅措变成了茶,而“怒”部落的文顿巴变成了盐。虽然此民间故事被视为爱情故事,但为何部落名为“辖”,以及为何是“辖”部落的女儿变为茶,或许是有文化隐喻意义存在的。

其实从语言的角度就可看出,“恰”正是藏语“茶”的读音。《汉藏史集》中记载吐蕃赞普都松芒波杰得了重病,一只鸟儿口衔一种吐蕃没有的绿色树枝停落在王宫附近,赞普尝过这种树叶后病好了很多,便派人四处寻找,最后一位大臣从东方汉地的密林中找到,并对赞普说,这种能做药的树叶被汉地人称之为“恰”。自此以后,吐蕃开始认识到茶叶并开始饮茶。而都松芒波杰是松赞干布的曾孙,于公元676至704年在位,因此茶叶进入藏地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704年。关于茶叶进入藏地的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来自《藏史》,据记载:茶叶是由“松赞干布之孙杜松孟波始自中部运回”。文成公主死于公元680年,晚于杜松孟波八年,由此可推出,茶叶来到吐蕃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672年。而这个时间比《汉藏史集》中记载的早了约三十年左右。

综合以上几个证据,无论以上哪种说法,只是在茶叶入藏的具体时间上稍有差异。或许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的古部落“恰”本来就与四川盆地的茶叶进藏有关系。这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考古发掘,但它地处交通要道为这种假设的成立提供了可能性,而从藏族民间故事以及茶在藏语中的译音来看,这种观点也是可能的。

结语

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由来已久。茶叶作为一种自然的物,作为一种现在常见的日常饮品,在从汉地传入藏地后对藏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汉藏历史、宗教祭祀、日常生活、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都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茶叶还见证了历史上汉藏关系的密切交往,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甚至一度成为维持维系祖国“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纽带。关于汉茶进藏的历史时期,应该远远超过文献上面所记载的时间,但这些都需新的证据和新的思维方式去证明去发现。在突破文献的局限性以后,利用多种渠道和类型的材料,或许能够还原一部分历史。即早在吐蕃之前,茶的原产地四川盆地已经与青藏高原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至少在汉代就已经饮茶成风的四川盆地或许也将茶叶视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物品,通过后来的茶马古道的线路运输到青藏高原。茶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应该是先被贸易沿线的诸多古部落接受,再逐步传播到整个青藏高原被广泛接收。这在社会阶层上,也应经历了从民间大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传播顺序。自饮茶之风传入藏地之后,吐蕃人对于茶叶的认知也随着双方的往来而不断加深。而今,茶叶,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条精神纽带,一个情感载体,成为雪域高原铸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

参考文献:

-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 [2]杨海潮.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J].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1卷第3期.
- [3]石硕.昌都:茶马古道上的枢纽及其古代文化——兼论茶马古道的早期历史面貌[J].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8

卷第4期.

- [4]韩建业.50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南道[J].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
- [5]任新建.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J].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12月.
- [6]石硕.吐蕃王朝以前雅隆吐蕃部落的经济变迁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1期.
- [7]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藏族文学小组编[J].藏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 [8]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 [9]恰白·次旦平措.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M].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 [10]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M].商务印书馆,2010年.
- [11]石硕.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M].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

作者简介:李锦萍(1987.01-)女,汉族,四川广元人,硕士研究生,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民族旅游、民族文化。

王静(1989.1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四川眉山人,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

(上接第2679页)

师对家长的培训,帮助孩子从实际问题迁移到了社会生活环境中。这种贯通式教育方式综合了儿童体能、智能以及言语、沟通、社交等多方面的需要,有效提高了儿童的康教融合率,为孤残儿童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教融合的干预模式不仅应用与学龄前儿童的早期干预,同时也扩大应用于院内更多有需求的儿童。

院内中度障碍儿童,主要安置在我院120培智教育学校,在为儿童教授康复、课程、文化以及技能等课程的同时,更加侧重于儿童生存技能及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培养,这种方式不仅能够补偿其缺陷功能更能促使其社会功能的提升,为最终进入主流社会,独立自主的生活做铺垫。

同时对于各类不能进入学校进行集体学习的重度与多重障碍残疾儿童为其提供送教上门的一种补充教育模式,为送教儿童实行科学评估,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定期为其提供各类教育、康复训练以及个训课程和家庭指导、提供相互支持等服务。根据融合教育的理念和要求,不断探索儿童素质发展的方式方法,创新推出了送教上门的融合之路。该方式不仅是提升教育公平性的有效手段,同时更能够帮助残疾儿童充分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此外,社工服务也承担部分融合教育的工作,为大龄儿童融入社区生活进行资源链接,帮助他们克服心理落差,做好进入社会的过渡准备,培养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基于社工系统,能够有效减少适应时间,更快更好的融入社会,去寻求高质量的生活。

总而言之,在“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教育服务理念下,儿童福利院能够以牢固树立满足孤残儿童发展需求的基本理念,不断创新探索学生社会化、独立自主的教育模式,有效保障了孤残儿童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更好彰显“融合教育”思想。

任何一所学校不能由于其自身教学理念、态度以及能力的差距而拒绝特殊儿童的入学,而目前各种隔离式的教学方式,同样也不利于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在对特殊儿童的教育方面,应当严格按照教育改革的要求,不断提升各项融合教育能力建设,真正促使更多的特殊儿童在普通教育机构能够享受到平等、均衡、优质的教育的权利。

基于融合教育的发展及未来,关键也在于教育理念上的突破,同样也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因此,融合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支持来帮助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受到成长的权利。虽然当前我院融合教育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正是这些不足,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和突破提供了思路与空间。如何更好的运用创新性的研究方式,帮助更多的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平等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享受到各项权利,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 [1]张福娟、马红英、杜晓新.特殊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2]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和全社会的帮助支持[D]“2002年孤残儿童照料与家庭寄养”研讨会论文集.
- [3]周克:学前特殊儿童教育[M].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 [4]张霞萍:融合保教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幼儿教育期刊[J].2003年第3期.
- [5]俞丛晓:新课程研究 学前教育.龙源期刊网[J].2010年第1期.
- [6]周念丽:学前融合教育的比较与实证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1-60.